

第二講 從一幅地圖談起： 如何認識十九世紀香港的語言

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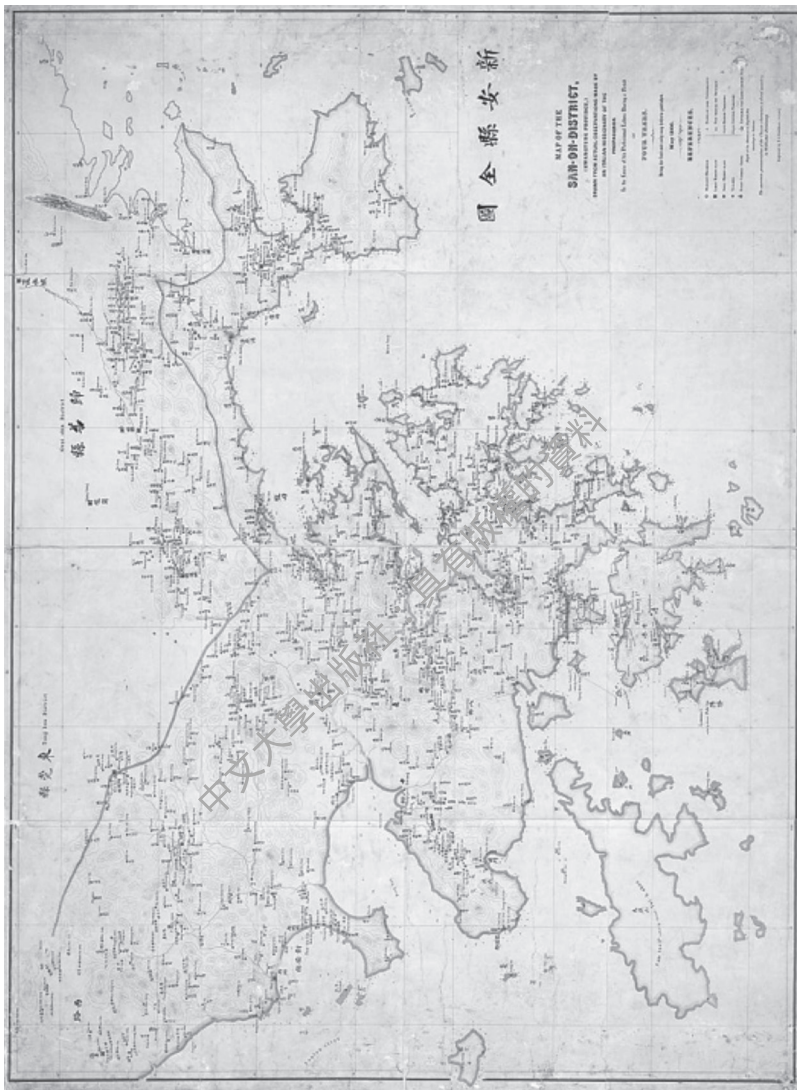
地名是一種地域指稱。人們聚居或外出，總是劃地命名，便於記憶，也便於交談。但是地名不僅是一個地方的名稱，地名背後往往包含一定的社會、歷史、文化訊息，反映人們對當地的認識和關注。為地方命名，以語言文字為標誌，所以地名本身也記錄當時的語言實況。香港位處珠江三角洲，本屬於粵語地區。但是香港百多年來，華洋雜處，南北共居，地方命名究竟是以什麼語言為依據？是漢語還是其他民族的語言？是粵語還是別的方言？學者一直未有確實的論證。

我們試從一幅十九世紀的香港地圖來看當年各地各區的名稱，嘗試作初步的探討。地圖上的地名用漢字標寫，並附有英文拼音。我們根據拼音可以擬構這些地名當時的讀法，進一步考究這些地名是否根源於粵語。同時，由於這些地名的漢字和拼音跟

今日地圖上的標寫不盡相同，這些不同究竟是反映粵語本身語音的變化？還是由於方言混雜而有所差異？書面材料是我們研究語言歷時變遷的基本依據。十九世紀也有一些根據當日粵語口語而編寫的材料。然而，這些書面語料所記錄的語言，是否和地圖上所呈現的現象相同或相類似？我們希望能通過這些一手的歷史材料，進一步考察十九世紀香港語言的實況。香港語言是單一還是多元發展？整個語音音系在這一百多年來，又經歷怎樣的變化和調整？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

新安縣全圖 (Simeone Volonteri, *Map of the San-On District*,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, nla.obj-231220841)



1. What's in a name? ——這是莎士比亞的名言。名字本身到底有什麼意義？名字究竟有什麼內涵？莎翁借劇中人的話語回答說：“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.”所以這花朵不管叫rose也好，叫玫瑰也好，叫薔薇也好，都是一樣的芬芳。中國人說，名無固宜，約定俗成謂之宜。古人的智慧，中外皆然。名字只是一種指稱，便於記憶，便於交談，大家都知道大家在說什麼。不過，試想深一層，所謂「約定俗成」背後，其實就有一大堆的道理。為什麼叫玫瑰，不叫薔薇？為什麼英文叫rose，法國人也說rose？但發音卻不一樣。名之所以為名，也許是一時靈感來到，妙手偶得的佳作；但也許在命名背後，另有所據，別有涵義。父母為子女取名，商人為新物品起名字，總不會亂來。粵語所謂：「唔怕生錯命，最怕改錯名。」命名的人總想在名字之中暗示某些希望，描述某些特質，說明某些事件。比方說，我叫張洪年，洪年，大年也。顯然我父母希望我能長命百歲。我現在能活到古稀之年，無災無難，總算不負他們當年命名的期望和祝福。

人名如此，地名又何嘗不是？當年珠江口的一個小漁村，取名叫香港。香港的「香」莫不是要點出漁家樂、樂無窮的佳趣？十里漁村，千擔漁獲，傍晚時分，陣陣傳來異香。香港的「香」一定不會是指魚香吧？根據學者的研究，香港早年是華南地區香料的

轉運站，以物命名。這樣看來，香字的由來可據，應該比較可信。把香港這地名翻成外文，以Hong Kong現身國際舞台。這個洋名字，顯然是一個音譯詞。但這音譯究竟是根據什麼語言而這樣拼寫？香港地處華南，音譯大概是本粵語發音。請注意：Hong Kong二字的主要元音都是“o”。按今日粵語，「香港」二字的標準發音，用國際音標拼寫應該是[hœŋ kɔŋ]，聲調不計在內。香港二字的粵語發音，各有自己的元音，「香」是œ，而「港」是ɔ，差別很大。這樣說來，香港一名的官方拼寫和實際發音並不相同，拼寫似乎另有所據。其實內中變化並不如是複雜。我們查看早期語料，香港二字的拼寫是hōng kong。例如1883年的一本粵語教科書 *Cantonese Made Easy* 中有這樣的一句：

通香港都有呢啲咁好嘍。

T'ung hōng kong tōi ni ti kom ho ke.

為什麼「香」在元音o上另加兩點：hōng？查歐西語言的拼音系統，往往就有ö這個字母，代表的就是œ元音。例如德文就有這個字母，但是英語一般來說並沒有這樣的元音，也不用這樣的字母。西洋人士早期來華夏，沿用ö來標寫粵語中的œ元音，香港一名就自當拼寫作hōng kong。後來也許因為便於英文書寫，就把這個ö簡化作o。約定俗成，香港的正式拼音從此就定為Hong Kong。

香港回歸至今已將近二十年，香港大名的翻譯，會不會也來一個名從國家語言，有朝一天改成 Xianggang？要是真的有這麼一天，What's in a name？這正名背後所蘊藏的種種原因，就大有故事可說。

2. 地名是一個地方的名稱，但是地名背後往往包含一定的社會、歷史、文化等訊息，反映人們對當時當地的認識和關注。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命名，是以語言文字為標誌，通過語言而訴諸於口，通過文字而記錄在案。地名本身往往就是記錄命名當時的語言實況。中國文字以表意的功能為主，只從文字書寫並不一定能看得出地名本身確實的發音是什麼，更無從知道同一個名字在不同時代是否保留同樣的發音？就算是書寫用的漢字不變，但是不一定保證發音沒有變化。要是我們用拼音字母標註地名，記錄當時當地的實際發音，一個字母，一個聲音，正可以補此不足。我們要是有一幅地圖，翻查地圖上地名所用的羅馬註音，按圖索驥，就可以推測當時應該是怎樣發音。而且根據這樣的發音，我們也就可以進一步推測這種發音來自什麼語言、屬於哪一個年代的語音系統。這樣看來，地圖上所顯示的不只是地域劃分、城市統轄等重要地理政治訊息，它同時也是一種語言寶庫，提供豐富而且可靠的資料，讓我們對當時當地的語言可以有

進一步的認識。

我們今天的講演就是選取一幅十九世紀的香港雙語地圖，進行初步研究，彙集地圖上的地名，把圖上所附的漢字書寫和羅馬注音進行對比，分析它的語音根據。這些地名為什麼會這樣拼寫，我們固然要解釋清楚；要是地圖標音前後出現不一致的地方，我們又如何解釋？我們希望能通過對這幅地圖進行仔細的分析和解讀，進一步認識十九世紀香港的語言實況。

3. 中國人編製地圖，由來已久。有關香港的地圖早在十五世紀左右已經出現；十七、十八世紀以後，更有一些由西方人編製。這些地圖，大都是用單一語言（中文或外文）記錄，而且有關香港的部分往往只有零星的記錄，一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才出現一份詳細的中英地圖。這一份地圖是由一位意大利神父來華傳教時編製，1866年出版。這位神父是 Simeone Volonteri (1831–1904)，1842年教會派遣來香港工作。他的中文名字是華倫泰理，大家都管他叫華神父，或和神父。當年他才二十九歲，年輕有為，數年之後，調往中國大陸，成為河南教區的主教。華神父在香港期間，當時香港已經割讓給英國，不過他時常外出，周遊香港附近地區。四年之後，編製新安地圖，主要集中香港、九龍，而且也遍及後來在1898年才租借給英國的新界地區。學者都認為這是現